

中法文化对话的一种新尝试：《远近丛书》

李 杨 [法] 李云龙

《远近丛书》是由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和中国北京大学跨文化研究所合编的一套比较通俗的文化对话丛书(2002年起始,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和法国 DDB 出版社陆续出版)。该丛书志在沟通不同文化环境中个人的体验和差异,在五万字的篇幅中,一半由中国人写,一半由法国人写,以生活中常见的观念为内容,以大学生、中学教师为读者对象,已出版生死、自然、梦、夜、味、游、家等十几种,皆以中、法文双语出版,后来法文版又译为意大利文。2008 年还将继续出版。

我们感到这是一套很有趣的书,在很多细微的地方显示了中法文化的不同。首先是中法文的标题有细微的差别。例如,中文版的《生死》在法文版是《死》,中文版的《美丑》在法文版中是《美》。这些差别好像是各方出版社的选择,但是这个选择也代表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中同一个概念的区别。中方的文章比法方的文章范围要宽,一般来说,在同一个标题中,中方涉及的故事、例子、历史事件和所用的参照都比法方更广一些。例如在《夜》中,中国的唐克扬和法国的马尔蒂娜·拉芬都注意到,夜是更适于思考的时段。但唐克扬更强调“夜”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它并非只是时间的某个特殊部分,而且是被理性之鞭驱赶的人生中疏离的一刻,是与“盛大的光明、无边的幸福、伟大的成就”相对的、世界结构的另一面;是“惊心动魄,气势宏伟的物质历史凯歌中的一点边角碎料,却又是人类丰富而细腻的内心里程的轨迹”。(《夜》,第 15 页)这就将“夜”的意义和联想大为扩展了。马尔蒂娜·拉芬却较单纯地认为:“夜揭示了人和上帝之间的深刻联系……我们能够脱离黑暗,走向光明,开始上帝的生活。”(《夜》,第 106 页)当然也并非每本书都是如此。如《味》这本书,中国作者龚刚讨论的是食品的味,法国作家保尔·阿利耶斯写的却是不同的人生品味,后者是一个更宽广、更深刻的话

题。龚刚说:“与西方古典美学中存在着的视听中心主义倾向形成对照,中国人的美意识却和视听中心之外的味觉结下了亲密的姻缘。‘美’这个字的本意是:羊大为美。中国人最早的朦胧的美意识同肥羊肉味道的感官感受不无相关。”(《味》,第 20 页)法国人相信人是通过餐桌上的变化而逐渐趋于风雅的。在法国,食物的味道可能成了一般意义的风雅的准备阶段。人们确实难以想象风雅之士竟然满足于吃快餐。“受到烹调高雅格调教育的孩子长大以后可能成为好父亲、好公民。学会怎样吃,实际上可以使人具备良好的判断力。”(《味》,第 24—25 页)

其次,我们感到中国作者更凭借自己个人的经验,相信自己的感情。法国作者则更喜欢强调文章的结构,更注重形式逻辑。一般说来,西方人经常引用著名的作者,似乎自己的思索还不够深邃。中方作者则加入了更个人的、更直接的感受,跟自己写的文章亲密相连。如上面提到的唐克扬的文章,一开始就讲述他的童年逸事。通过这些个人逸事来介绍中国文化的特征。马尔蒂娜·拉芬则更强调抽象的思考。这也决定了文章结构、笔调的区别。马尔蒂娜·拉芬提到在中国园林中,人们总是尽量做得隐秘,一步一步地揭示自然的美。而法国人则是要改造和重塑自然,以留下人类的烙印。马尔蒂娜·拉芬讲到她也感到两个版本的《夜》写作方法的差异。在她的部分中,她努力地组织和结构化自己的思维,而中方作者则更多地任随思绪驰骋。在《自然》一书中,乐黛云也是从一个童年的故事开始写起,她以当年之感受作为她文章的基础。安娜·索瓦涅阿尔戈则从另一个角度着笔。她的文章的结构更为清晰,例如她说:“为了在地球自然中探险,人类首先将自身幽禁起来。如果人类的思维在其中放了足够的恒心,他们将会发现一些代码碎片,含混地讲出神祇的秩序,由上帝创造的语法;这就是科学。”(《自然》,第 59 页)在《家》中,马尔蒂娜·谢阁兰也采用了形式逻辑的概念。她是从社会学角度解释“家”的,而且几乎只讲自己个人的经验。相对而言,陈家琪则比较感性,他通过“家”表达了他对“文革”期间社会状态的不满以及他所承受的痛苦。他的文章不拘泥于形式逻辑。在《游》中,王以培和奥里维耶·布雷的文章也有类似的区别。法方作者强调史实,比如十字军东征。王以培则更为着重亲身体验,如他在美国坐“灰狗”长途汽车时的感受。

第三,《远近丛书》的原则是双方作者应该靠自己个人的经验来介绍他的国家的文化。值得注意的是,中方作者和法方作者都在讲他们个人的故事,但这些个体的经验在文章里起着不同的作用。中方作者给读者的例子好像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很自然地按照他的经验来介绍中国文化。相反,法国作者更喜欢讨论具有特色的经验,因此这个经验不一定对法国文化最有代表性。比如,叶舒宪在

《激情》一书中,经常是讲了个人的故事之后,马上直接分析中国文化:“‘谈爱色变’不仅反映了当时现实生活中的状况,而且也是语言符号世界中某些禁忌和禁区的真实写照。”(《激情》,第24页)在《家》中,玛尔蒂娜·谢阁兰并没有强调家庭作为团体的功能。她选的重要话题是女人在家庭里的作用。换句话说,法方作者认为个体是最基本的单位,其次才是团体。中方作者则首先意识到,他们属于一个团体、属于一种文化。在中国传统里,个人只是因为属于比他更大的团体才能存在的。而对法国人来说,个体的发展和成就是更重要的。在为数不多的法国人表现相对乐观的领域里,家庭是其中之一。这是一个能得到安全感和帮助的地方。作者对未来持乐观的态度,因为她相信代与代之间的平衡。

第四,如果说法方作者的特点是受个人主义的影响,那么也可以说,中方作者的特点是受和谐理念的影响,而且各个领域都受到这个观念的影响。例如在《自然》一书中,乐黛云介绍人与自然在中国文化中的概念:“因人与自然本属一体,中国文化传统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很少把人类看做宇宙万物的征服者或统治者,他们认为人是世界万物中的一员,没有权利为自己的利益对其他生物加以改变或伤害。庄子说:‘圣人处物,不伤物,不伤物者,物亦不能伤他。’”(《自然》,第64页)相反,安娜·索瓦涅阿尔戈的解释是,在西方文化中,人类和自然之间有一些矛盾:“人类的身体是唯一与灵魂为一体的,因此也是唯一有意识的‘自然’,这使人类变成了神,而且是‘自然的主人和拥有者’。笛卡尔和他火热的灵魂将整体生物束缚在机械壳内。同样,整个自然世界花园一样被精心打理成几何体。”(《自然》,第60页)在《建筑》中,杨辛举了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天坛。他认为建筑是一个体现中国“和谐”的领域:“和”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美学范畴。在音乐、美术、书法、建筑等艺术中都重视整体的和谐。“圆不仅指外形的圆,而且是一种哲学境界,是一种宇宙观。也是一种审美观。圆是一种生命的流转,蕴含着宇宙万物,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生生不已地运动,体现了一种‘天行健’的精神。圆是一种生命的象征,也是祥和的象征。”(《建筑》,第33—34页)

第五,关于信仰和神话传说。感性的中方作者似乎更眷恋神怪,喜欢倾听虚幻世界的表达。神灵在他们的作品中也出现得更多。这种信仰还表现为自然现象的拟人化,如在唐克扬关于夜的描述中,月亮成了一位英雄的妻子。中国的风俗习惯赋予她慰藉亡灵、撮合姻缘的角色。对中方作者来说,自然也是神的造化。作者乐黛云在《自然》中讲到,神灵乃历史的起源,“自然”也由神灵主宰。法国作家似更注重人的能动性。神话传说在中文篇幅里无处不在,每每被自然而然地引出,在中国文化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夜》中就有八仙的故事、嫦娥的

传说、《山海经》里黑水的故事,还有后羿射日。同样,在《自然》中讲到了一系列大自然演变的民间传说,如牛郎织女的故事。直至今日,中国民间还保留“七夕”这个节日。因此,神话传说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更是理解中国文化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程抱一在一个座谈会上赞同中国人对古老传说的依恋情结。中国人意识到某些传说早已不符合事实,但这却不妨碍他们仰慕大自然。他们认为这是人类想象力的源泉,是和大自然交流的必要方式。与此对照,在法文的篇幅里,很少找到神话和传说。偶尔提到,都是古希腊神话和《旧约》、《新约》的故事。

第六,在中方作者中,历史的重要性显现着他们对祖国的感情。这一点要比法国作者更明显。书中表现出他们对国家历史灾难的忧虑。《科学》的作者杨焕明提到了中国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痛苦记忆。感到日本人对战争的态度让人担忧:“军国主义的幽灵仍在地球的上空徘徊。”(《科学》,第20页)唐克扬在《夜》中将中国定义为一个长期受独裁统治和战乱纷扰的国家:“这是一个苦难的、悲剧命运的民族。”中国作者对祖国的热爱体现在他们对传统的爱,对家庭、社会的爱。中国拥有几千年的文化,加之近年经济的惊人发展,出现了普遍的乐观气氛。法国人更讲求“祖国”的概念,“人民”和“祖国”都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新观念。尽管“荣誉的三十年”变革了法国,但当下时期对未知未来的担忧大于兴奋。奥里维耶·布雷在《游》中标示了法国人的精神状态从持续的欢愉逐渐地转变到模糊的境地。唐·昂热列可·舒尔乡在《建筑》中,明确地表明了法国人对未来的担忧:“我们的文明,正由于它的复杂性,奇怪地脆弱不堪,而且进步不知不觉地渗出一一种毒素,久而久之会侵蚀文明并导致其毁灭。我们的文明时代之前的那些伟大的文明已神形俱灭,但像瓦莱里曾说过的那样,吃一堑长一智,人们懂得了它们不是永恒的这个道理。虽然我们并不想预言家,但我们也不能避开这样一种前景。”(《建筑》,第92页)这种不同的心态也反映在《游》一书中。奥里维耶·布雷好像看穿了“游”的命运:世界好像已经到了尽头,“游”再也不能带来新的东西。除了以“灵魂置身其中的,内心世界的旅行”(《游》,第120页)。与此对照,在“游”这个主题上,王以培表现出内心的乐观:“有一天,人们都按照自己的心愿去世界各地旅行、生活,这时他们一定会发现,从前想象中的敌人并不存在,而敌人也许正是这种想象;那时,人们再也不会因为宗教而互相仇视,因为种族而互相敌对,因为观念而自相残杀。”(《游》,第80页)

最后,我们还发现了今天在中西两种文化中的新趋势。西方开始明白,太想主宰自然,人类会毁灭环境,自己也必遭毁灭。生态方面的忧虑越来越显现出

来。皮埃尔·雷纳在《科学》一书中阐述了平息西方统治自然野心的必要性,他说:“科学使人类成了自然的主人和占有者……他们从来没有中断过使用这种新的力量来改变世界。”这已遭到现代生态学的质疑,今后必须用另一种伦理范畴来平衡(《科学》,第141页)。杨焕明在《科学》一书中也说:“这些新的导向让我们重新思考人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这种新的一致性使中西文化有了更加相互理解和共同发展的基础。

附:已出版的《远近丛书》

《远近丛书》	中国作家	法国作家
自然	乐黛云	安娜·索瓦涅阿尔戈
美丑	朱存明	多米尼克·费尔南代
激情	叶舒宪	米歇尔·苏盖
家	陈家琪	玛尔蒂娜·谢阁兰
生死	汤一介	艾克沙维·李比雄
科学	杨焕明	皮埃尔·雷纳
梦	金丝燕	莫里斯·伯莱著
夜	唐克扬	马尔蒂娜·拉芬
味	龚刚	保尔·阿利耶斯
建筑	杨辛	唐·昂热列可·舒尔乡
游	王以培	奥里维耶·布雷
智慧	庞朴	伊泽·达尔坦-马斯盖利耶